

# 外国苏珊·桑塔格研究动态及前景

张 艺

**内容提要** 近年，英国主流媒体和美国的权威文库对苏珊·桑塔格的经典化进程大力推波助澜。我们发现，外国桑塔格批评动态呈现如此态势：经典化的批评机制与流行性的市场机制正携起手来，不再纠结到底是文学高于生活还是再现生活，而是超文本、跨媒介再现及演绎桑塔格非凡的文化影响力。展望未来中国桑塔格学界大有作为的三个前景是：神学地图学、中国化、人桥。

**关键词** 苏珊·桑塔格 研究动态 作家经典化 文学批评与市场机制

编制一年一度的文学事件表是英国主流媒体乐此不疲的一项工作。2015年新春伊始，《2015英国文学月历》就详细列出了将要来临的2015年一整年的文学事件表，其中包括寻归“荒原”的诗歌现代派运动领袖T.S.艾略特逝世五十周年、英国前首相同时也是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温斯顿·丘吉尔逝世五十周年、美国两大名校哈佛和耶鲁同一天授予荣誉学位的美国作家索尔·贝娄诞辰一百周年、“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领袖诗人叶芝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等纪念日，还有许多根据名作改编的电影上映排片表，以及每月出版的新书。这其中有日裔作家石黑一雄在睽违十年后推出的长篇新作，以及创作《撒旦诗篇》被穆斯林世界处以死刑判决的萨尔曼·拉什迪、“世纪小说”写手乔纳森·弗兰岑、“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学巨擘奥尔罕·帕慕克、“西方最智慧的女人之一”苏珊·桑塔格等人的新作。在灿若繁星的英国男作家中，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的名字也不难寻见。一生视写作为其信仰、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极大毅力在疾病海洋沉浮，勇攀批评与创作的双峙高峰，她作为作家的成功，特别是她一生痴心地在美、欧两种文化之间牵线搭桥的努力，终获大不列颠媒体的青眼。

与此同时，桑塔格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主要著作，包括《反对阐释》《激进意志的样式》《论摄影》和《作为隐喻的疾病》，以及六篇她从未结集出版的随笔，2013年下半年入选了声誉卓著的“美国文库”，说明其文学地位与批评影响不再依赖于受众对“知识明星”的接受心理，而是依靠其自身不断超越自我的作品和包容了众多主题的写作，以及对当代世界文学发展的分析与预测，树立起了经典作家摆

脱利己主义束缚和性别制约的榜样。2013年10月底,出版社在纽约布鲁克林组织了一场小型读书会,庆祝《苏珊·桑塔格: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笔》的出版。桑塔格的儿子里夫对桑塔格“认为自己是连接欧美知识界的批评家吗?”予以正面回应,他认为母亲不仅作为美国人毫不妥协地参与到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讨论中,同时作为一个作家在不否认自身的“美国性”前提下坚持了视自己为“文学共和国公民”的立场。里夫强调,桑塔格自身对小说家和短篇小说家身份的看重,不等于给她作为随笔作家、电影制作人、剧作家等创作出来的作品降级。<sup>①</sup>笔者认为,桑塔格是期待未来读者去发现其创作与批评、外国视野与本土立场原本并非二元对立和非此即彼的初心。

英国的主流媒体与美国的权威文库正在对桑塔格的经典化进程大力推波助澜,中国媒体与学界对其持久影响力又作何看待与评估呢?通过对外国桑塔格批评动态的研究与对未来中国桑塔格批评的前瞻,笔者希望能总结出桑塔格批评的趋势与潮流,预测未来桑塔格批评的动向与发展。

### 一、对外国桑塔格批评动态的研究

纵观外国桑塔格批评潮流出现的新动向,发现有以下几大特点:(一)两股潮流的合流:推翻桑塔格偶像崇拜与建构桑塔格经典地位与时俱进;(二)两个机制的携手:经典化的批评机制与流行性的市场机制共同引导;(三)两种观念的对话:文学高于生活、文学再现生活的中和平衡;(四)超文本及跨媒介的再现与演绎:纸媒呈现、影视再现与戏剧改编的多样性发展。

其一,批判与建构的同时进行以形成经典性。被奉为文化偶像的桑塔格高处不胜寒,近年来,美国发生了推翻桑塔格偶像崇拜的潮流,号召让身份多变的她回归一个“普通作者”的领域。2009年,《苏珊·桑塔格的丑闻》(*The Scandal of Susan Sontag*)对文化偶像的不辨时局、盲目自大进行批判,该“野传”其实是大众文化和城市文化动态关系研究专家、曼菲斯大学马库斯奥尔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巴巴拉卿(Barbara Ching)及其同事们结集系列批评文章出版的研究论著。这本论著收录有十二篇文章,无一不是站在“追问”的立场,质疑“苏珊·桑塔格何以在活跃于公共视线的四十年,为自己营造令人敬畏的光芒,同时留下任人非议的余地”<sup>②</sup>。卿等论者以戏谑的腔调对偶像进行严厉的批评,甚至联系法语中的一个说法——“丑闻的成

① 详见《话说桑塔格——访〈桑塔格〉编者大卫·里夫》,姚君伟译,载《译林》2014年第3期,第14页。

② Barbara Ching, Jennifer A. Wagner-Lawlor, eds., *The Scandal of Susan Sontag*, New York: Columbia UP, 2009, p.8.

功”(succes de scandale), 认为桑塔格的成功是丑闻的成功。她的丑闻在于“她拒绝被钉死在一个角色上, 于是从批评家摇身一变为导演、演员、剧作家、小说家, 最后又成了公共名人, 犹如暴露在闪光灯下的缪斯女神”<sup>①</sup>。卿说《丑闻》的目的就是要以颠覆性的解读解构桑塔格的权威地位。姑且不论艺术的求变是否就是“丑闻”, 也不论思想的庞杂是否就是“艳乱”(promiscuity), 深度挖掘偶像的私生活与“亲密文化”(Innigkeit Culture)及其写作的关系, 并展示偶像的身体(特别是其病躯)与其思想的矛盾, 从“丑闻”的观察角度, 从流言的发生、传播、证实及澄清的“有趣”视角, 展现另一面的偶像, 客观上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偶像有血有肉的精神全貌与写作缘起。在对文化偶像进行批判与解构的同时, 阐释和建构也在发生, 桑塔格批评也更趋向学术化及组织化。米克海尔·巴瑞斯尼可夫(Mikhail Baryshnikov)在纽约成立桑塔格研究中心。大卫·里夫在纽约富兰克林大道76号成立苏珊·桑塔格基金会, 自己担任董事会主席, 苏珊·桑塔格生前最后一任秘书安妮·江普(Anne Jump)则负责具体的财务和联络事务。2004年法国桑塔格研究会成立, 2011年3月美国纽约大学、纽约城市大学和纽约布鲁克大学联合举办了桑塔格研讨会, 桑塔格研究平台愈发宽广。这一时期, 也是桑塔格走进中文世界的黄金时代, 表明桑塔格研究正走向日益国际化, 并在与不同文化背景及接受语境的遭遇与碰撞中, 既历经批评的沧桑, 又生发出了活力与新意。2014年《苏珊·桑塔格》面世, 这部由杰罗姆·博伊德·曼塞尔(Jerome Boyd Maunsell)按照编年方式撰写的评传以及正在撰写之中的授权传记《苏珊注解》(Notes on Susan), 回顾并重建着对文学偶像的敬意。著名美国青年作家本杰明·墨瑟(Benjamin Moser)应桑塔格独子之邀为《苏珊注解》担纲执笔, 他曾经凭借为巴西女作家克拉丽丝·利斯佩克朵(Clarice Lispector)撰写的传记《为何此世》(Why This World)获得美国图书评论大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提名。他透露会从桑塔格生前朋友圈提取大量信息, 结合访谈及当事人的回忆, 尽量还原与描绘桑塔格的肖像及其文学生涯。有理由相信, 这部最贴近传主事业与生活场景, 并得到传主儿子及其生前朋友鼎力支持的传记, 定会在桑塔格经典与偶像地位形成的过程中起到加速及传播作用。

其二, 经典性与流行性在市场的作用下结合愈发紧密, 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是乐此不疲。批评界、文化界、高校及研究机构中不断涌现从不同视角审视偶像的批评著述, 实际上对经典地位的形成及巩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09年普林斯顿

① 张和龙《亲历〈桑塔格的丑闻〉》, 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8月22日, 18版。

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作家菲利普·罗佩特（Phillip Lopate）撰写的批评著作《桑塔格札记》（*Notes on Sontag*）。该书的标题是罗佩特直接表达对桑塔格的经典名文《坎普札记》的热爱与致意。他对桑塔格这篇作品的感觉可以用庞德对经典的感觉来代言：

“某些作品成为宝藏和基础，一旦阅读就会使你终身受益。”<sup>①</sup> 作家打量作家的眼光，自然与批评家看待作家的效果有所不同：首先，因为有创作经验，作家自然会把自己的写作感受带到评论里去，因而较能身临其境地回味当事人的写作，也因着“移情的了解”，在讨论与作家写作相关的话题时会有娓娓道来的舒畅感受。《桑塔格札记》就是这样一本书。它虽然没有遵循学术撰写的条框，但是随笔写就的散文却不失批评的力道。作者时而定格于与桑塔格的相遇与交往，时而发挥自己对桑塔格作品的见解，时而善意地揶揄“桑塔格的规则”，时而评点她的生活轶事，但更多是提问起笔，条分缕析，邀请读者一同踏上思索之旅。《札记》的出现，像是一个裁缝轻巧地在补缀关于桑塔格的一切，让我们多了一个类似文学批评家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等人提出的“作家批评”传统，成为桑塔格经典化道路上一个里程碑。出于桑塔格举世闻名的女知识分子的身份，不少美国女性主义或妇女学研究专家，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杰妮芙·瓦格纳（Jennifer A. Wagner-Lawlor）教授、纽约布鲁克大学的莉萨·迪德里克（Lisa Diederik）教授以及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之一、普林斯顿大学的肖沃尔特教授等依托高校科研机构，组织成立了妇女写作学会，主持了多场美国女权主义者盛会。这些会议得出如下结论：以桑塔格为代表的“女性”（female）阶段是女性写作经过“阴性”（feminine）、“女权”（feminist）两个阶段之后出现的第三阶段，也就是女性自我意识全面觉醒的阶段；桑塔格传承并发展了伍尔夫在名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中所表达过的思想——“我是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却不是一个女权主义的激进者”。桑塔格所作的宣言，承担有损偶像清高的风险，声援女权主义的运动，同时表明自己并不脱离女性阵营的温和与理智。作家个人及学会团体的集中发力，进一步树立起桑塔格的经典地位，与此同时，在文学市场的作用下，经典性和流行性日益紧密结合，焕发桑塔格评论的时尚与活泼气息。在此期间，学术界的研究也开始“松动”，2005年出版的格林尼治村里的“邻居”爱德华·菲尔德（Edward Field）撰写的《那个愿意娶苏珊·桑塔格的男人及其他波西米亚时代的亲密文学肖像》（*The Man Who Would Marry Susan Sontag and Other Intimate Literary Portraits of the Bohemian Era*）和桑塔格母校芝加哥大学2012年出版的《用法

① Mihaly Szegedy-Maszak, “Literary Canon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 *Studies in Philology*, 16, (2001), p.17.

语做梦：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苏珊·桑塔格和安吉拉·戴维斯的巴黎岁月》（*Dreaming in French: The Paris Years of Jacqueline Bouvier Kennedy, Susan Sontag and Angela Davis*）就是两个很好的样本：一个是从维多利亚式的婚姻角度展开对偶像青春期波西米亚式生活与写作关系的追踪；一个是以“追忆似水年华”的基调铺陈对偶像负笈留学的雄心与离婚缘由的回溯。从爱情与婚姻的角度认知并再现文学偶像的写作，在此之前被认为是一个“不入流的视角”，近年来却随着“情感理论”在西方学界的回暖及流行，逐渐成了结合文学时尚与严肃学术的时髦写法。

其三，文学是高于生活还是生活的再现，这两种对文学的看法在碰撞之中趋向平衡。2014年，德国学者丹尼尔·施瑞伯（Daniel Schreiber）撰写、美国学者大卫·博伦迈尔（David Dollenmayer）翻译的《苏珊·桑塔格：一个传记》（*Susan Sontag: A Biography*）由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通过对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美籍欧洲导演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以及桑塔格独子大卫·里夫（David Rieff）围绕对“成为流行明星（pop icon）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主题的访谈，探寻桑塔格的多重身份演绎对美国的公共文化语境及政治辩论传统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该书还留心细察了桑塔格与她的好友、出版商罗杰·斯特劳斯（Roger Straus）的海量信件，继罗利森和帕多克之后又一次关注到桑塔格“耀眼的文化模式”——妇女解放运动和《时尚》杂志的融合，知识分子、时髦而激进的问题与时尚市场之间的组合，以及出版界在助推其集经典与流行于一身的巨大作用。施瑞伯没有纠缠于文学是高于生活还是再现生活，而是呈现好友艺术家及电影人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和伍迪·艾伦（Woody Allen）镜头中的桑塔格，同性爱人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和摄影师黛安·阿勃丝（Diane Arbus）镜头中的桑塔格，以及为极品伏特加（Absolut vodka）拍摄广告的桑塔格，事实上呼应着她的最后一个同性伴侣安妮·莱博维茨在2009年出版的作品集《一个摄影师的生活：1990—2005》（*A Photographer's Life: 1990-2005*）序言中所说的“我没有两种生活。这是一种生活，私人照片和工作照片都是它的一部分”<sup>①</sup>。美国社会文化批评家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也很好奇社交生活及亲密关系之于桑塔格写作主题的实际影响，在《时尚先生》（*Esquire*）中，卡津在文学之外寻找蛛丝马迹，迈进自传性的事实领地，发现“文学与生活有一定的汇通，这汇通的起点不在文本之中，不在表现方式之中，而在文本之前，之外”，是汇通在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和巴赫

① Annie Leibovitz, *A Photographer's Life: 1990-2005*, New York: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09, introduction, p.2.

金所说的“对话”过程中。2015年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苏珊·桑塔格谈话录》（*Conversations with Susan Sontag*），是在桑塔格的经典著作中占有一席重要地位的“回顾性集子”<sup>①</sup>，主编利兰·波格（Leland Poague）集结这些转载的访谈，初衷是希望“从时空上扩大这些谈话录的受众面”，“而不只是让它们为原发表地的读者服务”。许多外国桑塔格专家表示，研究桑塔格在接受采访时的谈话记录，对研究其作品中生活的再现程度十分重要。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词《我是讲故事的人》中，也重申了“文学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文学的自传性，也就是文学对生活的再现，同样是文学不可忽视的一个支流。桑塔格曾经强调，写作的意义“不是要表达自我”，因为“艺术作品中发生的事情就是对个人的超越”，而《谈话录》就是她关于文学与生活双重思考的完美记录。桑塔格写真片《旁观桑塔格》（*Regarding Susan Sontag*）的导演南希·凯兹（Nancy Kets）就指出，桑塔格是一次坎普事件。可能囿于批评者文学观念的偏颇，以前的批评著作多是从文化、政治的角度审读桑塔格的作品，而《苏珊·桑塔格：一个传记》从生活与文学的密切关系的角度调整了批评界的这一失衡。总之，文学与生活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这一认识日益被外国桑塔格批评者所接受。

其四，外国桑塔格批评呈现超越纸媒的态势，以再现的多样性与演绎的跨界性为其经典化平添了生机与活力。一方面，桑塔格的文本反复地被再版或重新编辑出版，影响着一波又一波的读者和作家；她的作品不断地被翻译家“摆渡”到外国语境，遭遇着一轮又一轮批评和接受；关于她的一切也在被不断改编为艺术写真及影视作品，以超文本的形式演绎、言说和传播着影响力。另一方面，她的形象出现在图书馆里、学院内、街道涂鸦墙上、地铁宣传栏里、室内剧剧院场内、话剧舞台上，甚至是商店里出售的杯碟上，在高深的学府和欧美流行市场不断映入人们的眼帘。而有些艺术工作者更是显性地让桑塔格闪现在他们的作品中，例如最近的好莱坞电影就曾经两次在男女主人公的对话间提起她，一本正经地崇敬还是嘻哈地戏谑不是重点，重点是桑塔格依然活跃于当代的文化视野和创作潮流中，以自身的经典性证实了经典的恒久性。南希·凯兹的艺术写真片《旁观桑塔格》就是为再现桑塔格的生平与写作而互文了其经典摄影著作文本《旁观他人的痛苦》（*Regarding the Pains of Others*）。该电影于纪念桑塔格逝世十周年的2014年12月8日在美国HBO广播公司上映，并参加了2014年翠贝卡电影节巡演，激起了新一轮的“桑塔格热潮”。影片中，凯兹剪辑了很多桑塔格的

① 利兰·波格《〈苏珊·桑塔格谈话录〉序》，姚君伟译，载《当代外国文学》2013年第3期，第163-166页。

真实影像与图片作为底本,包括她早年为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试镜的青涩影像,导演伍迪·艾伦的电影《泽利格》中对她采访的镜头,以及时尚的《小姐杂志》为她拍摄的靓丽照片,着意再现了桑塔格的形象与其自身经典化进程的关系。作为一部偶像人物纪录片,影片从旁观者的角度穿插了许多对其同事、朋友、特别是情人以及诋毁者的访谈片段,从开放与包容的视角展现了以桑塔格及其写作为中心的那段美国现代波希米亚的黄金时期,其立意与电影叙述技法与2014年在中国上映的《黄金时代:萧红传》的实验性传记拍摄可谓不谋而合。而桑塔格此生唯一一部“女人戏”《床上的爱丽斯》(*Alice in Bed*),更是被多次改编并以不同语言呈现在各种舞台,在表演的不断再生过程中,凸显出文学文本超越时空的长久魅力。经过“易装”与“变形”,《床上的爱丽斯》成了《不起床的爱丽斯》和《爱丽斯》,并于2009年登上了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的舞台。这一超越文本传播的经典化过程,也成了艺术创作走向国际化和不断焕发艺术生命力的过程。

## 二、对未来中国桑塔格批评的前瞻

关注外国的桑塔格批评,是为了建树中国学者的研究气派。回顾桑塔格批评的学术史,是为了前瞻性地预测潮流的发展方向。简要概述未来中国桑塔格批评的趋势,或可有以下三个方向:一、著述外国学界未曾发现的神学文学地图;二、阐发“他山之玉”东渡至中国“此岸”的文化大同境界;三、重视弥合东西鸿沟“人桥”的跨国传播影响。

首先,外国桑塔格的批评界几乎没有一个批评家专门提问桑塔格的信仰与写作的关系,在目前所及的苏珊·桑塔格研究著作里,仅有《苏珊·桑塔格:哀悼的现代主义者》(*Susan Sontag: The Elegiac Modernist*)一书中提到,“某种诺斯替式的追思很可能推动了作家对自我意识进行探索,而这种探索意图在存在主义的艺术中被证明是自洽的”<sup>①</sup>,这本书的作者塞尔斯·索恩亚(Sayers Sohnya)称之为“这种现代主义的两难处境”<sup>②</sup>。可惜索恩亚仅浮光掠影地揭发桑塔格祈灵于某种混合宗教的灵泉,不曾进一步追问这个在桑塔格写作里“排第一”的问题——信仰及其与写作的关系。所以,中国学者有机会完成外国学者遗留下来的命题,追踪桑塔格经典写作空间与其信仰之间分裂与聚合的过程,不断重新走进其经典的写作空间,发掘桑塔格将自己秘

① Sayers Sohnya, *Susan Sontag: The Elegiac Modernist*,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Inc., 1990, p.11.

② Sayers Sohnya, *Susan Sontag: The Elegiac Modernist*, p.11.

密信仰古老的两希文化与印度文化交融的诺斯替主义信仰散播至其系列文本的空间建构与母题叙事。如《恩主》文本中的梦叙述与埃及—叙利亚思辨性神话体系，《床上的爱丽斯》文本中的女性意识与撒旦之城罗马的人文主义景观，都只是其中的惊鸿一瞥，我们可能可以以此还原出一张桑塔格经典写作空间中的世界神话地图，实现中国学者在桑塔格研究方面的原创性突破。

其次，美国“诗歌之父”惠特曼通过爱默生间接地接受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影响，又反过来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新诗运动。这一现象本身充分说明了中美诗歌的多重交流及其融合性和精神上的合一性，显露源远流长的中美文化交流关系。南京大学刘海平教授在《奥尼尔与老庄哲学》一文中谈到奥尼尔做起过老庄哲学和美国文化融合的“大道之梦”。到了当代中国，我们研究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左翼激进思潮与我国“五四”传统及文化语境的现代化进程，研究桑塔格的“同时”观对“中国梦”的启示，应该成为非常值得期待的苏珊·桑塔格研究中国化与现实化的重要课题。

最后，时代要求必定会影响和改变我国外国文学批评的重心，引导我们重视经典作家的人桥作用。苏珊·桑塔格以为世界和平、为作家尊严和知识分子良心而写作为使命，在她所谓的“文学共和国”中承担了一个文学公民所肩负的道德职责。流行而经典的桑塔格一生致力于填平美欧文明之间的文化断层，亲自将一些被文学潮流淹没而兀自发光的外国作家作品引入美国文学殿堂，甚至不惜遭受这些作家的冷遇，令人不禁会对文学的“义利观”以及作家的道德境界等问题展开思索。

\*本文为南京理工大学自主科研专项资金项目“历史进程与艺术嬗变：苏珊·桑塔格后期跨媒介写作的符号学研究及文学经典的重读及传播”（30915013110）及江苏省社科应用精品工程外语类课题“国际符号学视野中苏珊·桑塔格后期长篇小说、戏剧及电影创作研究”（15jsyw-4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苏 玲